余上沅抗战戏剧社会教育观的再解读

丁芳芳

摘 要: 本文在分析余上沅抗战戏剧社会教育理论阐述的基础上,结合其以国立剧校为中心的抗战戏剧社教实践,突破学界的已有论点,运用大量一手资料重新解读余上沅的抗战戏剧社教观及其历史贡献,重新认识以民众动员为目的的抗战社教戏剧所起到的巨大历史作用,并由此进一步解读抗战戏剧理论和文化抗战等目前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 余上沅;抗战戏剧社会教育观;再解读
中图分类号:K825.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9142(2018)06 -0101 -08

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重要人物,众所周知余上沅抗战之前竭力提倡国剧运动,希图建立民族性的现代话剧体系,却难以实现其艺术理想。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建国后对余上沅的研究一度处于冷寂状态,新时期出版的重要戏剧史著作中较早关注他的是陈白尘、董健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①],另外几本则很少提到[②]。1990 年代以来研究论文明显增多,大都认为"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首要贡献,在于戏剧

收稿日期:2018 -07 -02

作者简介:丁芳芳,女,安徽无为人,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江苏 南京 210093)

① 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年版。该书对余上沅的研究集中在"第二章第八节:余上沅和徐志摩"(顾文勋执笔,第 131 -134 页,下同),肯定其"在新月社发动的'国剧运动'中,余上沅和徐志摩起了重要作用"(第 131 页)。通过分析《兵变》《回家》《塑像》三剧,认为"余上沅所持的超人生、超现实的唯心主义艺术观以及体现这种艺术观的剧作,作为现代戏剧之一元,自有其价值与历史地位,但是不能融入'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戏剧运动的主潮"(同上,第 134 页),他的创作和他极力倡导的"国剧运动"一样,也是"一个半破的梦"(同上,第 134 页)。对其抗战时期创作没提。在"第六章 现代戏剧的黄金时代(一九三七年 -一九四九年)"概述中,也没有评述余上沅和国立戏剧学校。

② 1980 年代以来重要的中国现代戏剧史著作如田本相主编《中国近现代戏剧史》(副主编胡星亮、胡志毅,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黄会林主编《中国百年话剧史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都没有提到余上沅;方志平编著《中国话剧》(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5 年版),王卫国、宋宝珍、张耀杰著《中国话剧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年版)未提;田本相、石曼、张志强编著《抗战戏剧》(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也没提;石曼著《雾都剧坛风云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年版),以戏剧家为中心记录了重庆时代的许多话剧活动,也未提到余上沅。另外一些通俗类戏剧读物如于嘉茵著《守望民国戏剧》(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年版)与于嘉茵著《民国剧人剧社》(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 年版)("民国政治文化与人物"丛书之一)等,也没有提到余上沅。

理论的开创性研究。他及其戏剧同仁通过‘国剧运动’有力推进了中国戏剧的现代转型”①。研究内容主要在四方面:一、关注其为主倡导的“国剧运动”②。二、关注其戏剧理论③。三、关注余担任国立剧专校长时的戏剧艺术教育实践④。四、关注国立剧校的抗战戏剧公演。石曼详细梳理了剧校的公演及演出轰动情况⑤。李乃忱《国立剧专史料集成》⑥第三卷第四章《喜见硕果——教学做合一辅助社会教育》,收集了剧校抗战期间开展戏剧社教公演的详细资料⑦。

前辈荦荦路蓝缕,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仍有不足之处:首先现有研究集中在其国剧运动时期,其次对抗战时期他担任校长的国立剧专研究多外在描述,集中研究的是其艺术教育实践⑧,缺乏对余的抗战戏剧社教理论及实践的整体性观照、内在动因及社会影响分析。

一手史料表明,抗战期间余上沅的戏剧理念和实践也发生急剧转变,由重视唯美的戏剧艺术转向越来越重视戏剧的社教功能。就笔者研究,余在抗战期间发表的近 20 篇文章⑨基本都涉及戏剧社教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总结,因此,对余上沅戏剧理论的研究和历史贡献的评价不应局限于国剧运动时期而忽略其更为重要的抗战时期。

本文力图突破现有论述,通过大量一手史料对余上沅抗战时期的戏剧社教观进行细致的再解读。包括:1. 具体内涵和特点。2. 以国立剧校为中心的抗战剧教实践。3. 简略评述其形成原因及社会影响。在重点分析其抗战戏剧社教观以及大量社教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认知他本人及国立剧校在抗战时期的历史贡献。鉴于抗战戏剧社教工作是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论题不仅有助于深化中国现

---

① 罗昌智、何浙丹:《终身做戏剧的仆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② 代表论文有:胡星亮的《国剧运动再评价》(《南京社会科学》,1990 年第 5 期)、《论“国剧运动”的话剧民族化思考》(《文学评论》,1998 年第 3 期);宋宝珍的《余上沅及其“国剧运动”》(《戏剧艺术》,2002 年第 3 期);马衍的《不逢其时的戏剧悲歌:对“国剧运动”的再认识》(《戏剧》,2010 年第 2 期)、刘思远的《国剧运动的戏剧史学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谭为宜的《“国剧运动”艺术创造之反思》(《四川戏剧》,2011 年第 4 期),周云龙的《国族想象的败绩与调适——从“国剧运动”到“农民戏剧”》(《艺苑》,2009 年第 1 期);高雪的《理想戏剧之梦——“国剧运动”再评价及其他》(《求实》,2012 年第 1 期);马慧的《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与中国国剧运动》(《江西社会科学》,2012 年第 7 期);方冠男的《新时期“国剧运动”研究问题纠偏》(《戏剧文学》,2013 年第 9 期);顾金春的《“国剧运动派”的群体构成及文化心态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0 年第 2 期);王青的《论梁实秋与国剧运动》(《艺术百家》,2006 年第 10 期);张同铸的《探索戏剧的先驱:国剧运动之反思》(《艺术百家》,2004 年第 6 期)。

③ 如沈达人:《余上沅及其戏剧理论》,《艺术百家》,2010 年第 6 期;段绪懿:《论余上沅的戏剧表演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13 年第 5 期;包燕:《现代缪斯的诱惑和回应——余上沅戏剧美学之西方探源及现代评价》,《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 期等。

④ 以国立剧专为关键词在 CNKI 上查询,近二十五年研究文章共约 18 篇,多为回忆性文章,少学术论文。如谢增寿:《江安与国立剧专》,《文史杂志》,2004 年第 1 期;濑户宏、陈晶:《国立剧专与莎士比亚的演出——以第一次公演〈威尼斯商人〉为中心》,《现代中文学刊》,2013 年第 5 期;无作者:《江安与国立剧专的不解之缘》,《文史杂志》,2005 年第 1 期等。赵星:《国立剧专十四年:余上沅戏剧教育实践初探》,《戏剧艺术》,2012 年第 3 期。

⑤ 石曼:《重庆抗战剧坛纪事:1937 年 7 月 – 1946 年 6 月》,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 年版。

⑥ 李乃忱编著:《国立剧专史料集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 年版。

⑦ 该书第三卷所载第四章的内容《喜见硕果——教学做合一辅助社会教育》,就以大量资料说明了这一点。内容有:(1)《国立剧专历次演出剧目一览表(1936—1949)》;(2)《珍贵的艺术档案》中有 1—94 届公演秩序单和剧照;(3)《辅助社会教育》中有国立剧专各届学生深入社会巡回演出、筹款演出、纪念演出及进行抗敌宣传的旅行公演等资料。其中第二项的资料尤其珍贵。编著者在各位剧专校友的协助下,尤其在江安国立剧专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下,把国立剧专所举行的 1—94 届演出的说明书、剧照等资料收集起来,经过整理、注释后按顺序编排,刊印出来。

⑧ 众多研究文章中,只有《一个“半”残破的梦中——余上沅与国剧运动》(陈建军:《戏剧文学》,2006 年第 12 期)明确提到余在 1935 年就任国立戏剧学校校长,这个学校的建立目的就是为了戏剧的社会教育。

⑨ 余上沅抗战期间(包括战争爆发及结束前后一两年)所写文章主要有:《教育电影的实施:教育电影与戏剧》,《教育与民众》,1936 年第 7 卷第 8 期;《教育电影与戏剧》,《教育与民众》,1936 年第 7 卷第 8 期;《中国戏剧运动》,《文艺月刊》,1937 年第 10 卷第 4 – 5 期;《我们的国立戏剧学校——为学校周年新闻纪念特刊作》,《学校新闻》,1937 年(周年纪念特刊);《战时戏剧讲座》开讲词《战时戏剧讲座》,正中书局印行,1940 年版;《纪念戏剧节重申前议——陪都需要一个剧场》,《戏剧战线》,1940 年第 2 卷第 1 期;《抗战三年来的国立剧校》,《现代华侨》,1940 年第 1 卷第 6 – 7 期;《国立剧校旅渝劳军公演记》,《戏剧战线》,1940 年第 12 期;《献给抗建宣传的同志》,《新演剧》,1940 年复 1 卷;《怎样研究戏剧——戏剧的功效》,《读书通讯》,1941 年第 3 期;《准备戏剧复员》,《戏剧时代》,1944 年第 1 卷第 3 期;余上沅:《戏剧与新生活》,《新运导报》,1947 年第 14 卷第 6 期;《戏剧与侨胞》,《华侨先锋》,1947 年第 9 卷第三、四期;《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概况》,《教育通讯》,1947 年(复刊 3 第 12 期)等。

代戏剧史研究,也能进一步拓展目前学界热议的文化抗战研究。

一、抗战戏剧社教观之一:理论著述

余上沅的抗战戏剧社教观,较完整地体现于他战时相关理论著述以及有关国立剧校的工作宗旨和规划中。主要观点有:

1. 国难当头,在民众中传播复兴民族思想的戏剧社教工作是抗战时期戏剧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他回顾话剧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认为在抗战阶段其戏剧的历史使命正在于教育民众、启迪民智、"戏剧救国":"清末的话剧是被利用作复兴民族、宣传革命、改良社会的工具的……从前只是一个政治革命,目前才真是受了外人的压迫,我们要一致御侮,一致防暗算,共图民族生存。在这种非常时期里面,中国戏剧运动者与其它国家的戏剧运动者似乎稍有不同,应该采取非常的手段……戏剧救国,只是由于苦干。"①

2. 战时中国文盲众多,戏剧比学校教育见效快,是最适宜的社教工具。他仔细考虑过戏剧作为抗战社教工具的优势,明确表示相比于学校教育,在抗战时期国家危急、文盲众多的特殊国情下,戏剧是最好的社教工具:"我们研究戏剧,其主要目的是在辅助教育。现在中国文盲之多,教育之不普及,实在可怕。兴办学校,推广平民教育,固然是当务之急,不过学校教育的功效虽然是根本的,但是比较来得迟缓……它是建立中国新文化,辅助社会教育,培养国民道德,陶冶性情,使顽者廉而?(笔者注:一字不清)者立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②就中国当时的国情来说:"走过任何一个剧场,看看售票的秩序,场内观众的谈笑叫嚣,涕泣,吃食水果香烟,以及种种不法的行为,则知中国的观众,勿0(笔者注:一字不清)说是人民,尚需要相当的教育,但这些人们你不能把他们关进教室,只好借重于社会教育,而社会教育收效果最快最宏的工具唯有求诸于集体受教的戏剧教育。"③

3. 戏剧作为社教工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优势,并因其动作性强尤其适合年轻人。"戏剧确是一件良好的社会教育工具,它以潜移默化的能力使群众受着感染的力量而达到教育的目的,使社会上的人们于娱乐中不知不觉的得到改善人生的教育,这真是一个良好而安全的方法"④。"因为别的艺术都比较抽象,唯有戏剧最具体……不但它的效力比别的艺术大,而且它最适于爱动的青年人,何况它还是学作人的一种方法。我们除了劝青年人学习各种科学文学以外,还要劝大家学习戏剧,来训练我们的人格,充实我们的生活"⑤。

余上沅战时剧教观的特点主要有:1. 战时剧教观的国际视野。余上沅具备深厚的东西方戏剧素养,对戏剧教育功能的认知兼具国际视野。首先他从东西方戏剧的起源探讨其教育功能:"中国的戏剧发生于巫觋,那时的歌舞原是教化的形式,西方戏剧发生于战舞,而战舞更是一种军事教育。中世纪的戏剧,无疑问的是一种宗教教育的宣传手段,可见戏剧很早就已经具备着教育的意味。"⑥其次他敏锐捕捉到世界各国对戏剧社教工作的重视:"现代新兴国家,如苏俄,德国,意大利,对于戏剧事业的重视,较之对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诸事业的努力,简直没有什么差别。这不是过分。教育的目的本来是要训练人的高尚品格,与应付生活的知识与能力。戏剧的目的也正是如此。"⑦他因此由战前推崇美国的艺术戏剧转向战时关注和赞扬前苏联重视民众教育的文艺政策:"苏联在三四年前曾有一个时期风行宣传剧,而其近年来的电影,如曾在中国上演的'生路','夏伯阳'等,我们很容易地寻出其中所包括的教育

① 余上沅:《中国戏剧运动》,《文艺月刊》,1937 年第 10 卷第 4 – 5 期,第 1 – 2 页。
② 余上沅:《怎样研究戏剧——戏剧的功效》,《读书通讯》,1941 年第 3 期,第 11 页。
③ 余上沅:《戏剧与新生活》,《新运导报》,1947 年第 14 卷第 6 期,第 17 页。
④ 余上沅:《教育电影与戏剧》,《教育与民众》,1936 年第 7 卷第 8 期,第 1452 页
⑤ 余上沅:《怎样研究戏剧——戏剧的功效》,《读书通讯》,1941 年第 3 期,第 12 页。
⑥ 余上沅:《教育电影与戏剧》,《教育与民众》,1936 年第 7 卷第 8 期,第 1452 页。
⑦ 余上沅:《怎样研究戏剧——戏剧的功效》,《读书通讯》,1941 年第 3 期,第 12 页。

的成分。他们有一句口号,‘以电影的戏剧去教育群众,扶助社会主义的建设’……这种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法国的国家戏院和苏联是一样,也是属于教育部,这也可以证明戏剧电影与教育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①

2. 强调抗战社教演剧的应用性研究。他仔细比较过作为社教工具的电影和戏剧:“两者各有优点。电影可以大量制作,分配各地,同时公映,然而它终是借重于影像及机械,不如以有血肉的演员当着观众之前而表演的戏剧的感人力量之深……希望电影与戏剧两界的同志携起手来,在辅助社会教育这件重要的工作上,竭其才智能力,尽我们应尽的责任。”②他也着重思考采用何种形式才能克服限制来充分发挥戏剧社教功能。如他借鉴国外演出经验,提出运用戏剧车解决戏剧下乡距离遥远、食宿不便的实际困难③,并介绍艾本哈克发表在纽约《剧艺月刊》中的一篇短文为汽车剧场的制造提供参考。这种新型的汽车剧场前部是一辆普通载重的汽车,工作人员携食品及行李乘坐,后部是一辆特制拖车,撑开作舞台,关上可装载布景及各项舞台用具,让汽车能通行的地方都可以演戏,余甚至详细研究了这种汽车舞台的构造、装置及使用方法。他同时强调国立剧校的一切理论研究均应围绕抗战需要以实际应用研究为主:“我们(笔者注:此处我们指国立戏剧学校)在学术的研究方面,也有着十大目标”④,除了最基础的“(一)戏剧理论之介绍,(二)中西戏剧史之探讨外”⑤,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和社教演剧有关的应用性研究。如“(三)编制术之演进,(四)表演术之研究,(五)布景设计之改进,(六)舞台技术之改良,(七)导演之理论与实践,(八)演出技术的研究,(九)灯光的设计”⑥,并且对抗战社会教育中广泛应用的剧种如儿童剧,学校剧,农民剧,广播剧,电影剧等等,亦均有专人担任研究。一有所得,即分别刊布,以备攻错(笔者注:原文两字如此)。

二、抗战戏剧社教观之二:剧校的成立背景、工作宗旨与规划

余上沅的抗战剧教观,也充分体现在他作为剧校校长的工作宗旨与规划上,这首先是和剧校成立的时代背景有关。

1. 全民抗战社会教育是剧校成立的特殊的、重要的时代背景。张道藩⑦所撰《国立戏剧学校之创立》⑧,详述了剧校成立经过,其中值得重视的有:(1)联名发起人陈立夫、罗家伦及张道藩等十三人大都是国民政府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高官或大学校长,也是抗战戏剧社教规划的积极倡导者⑨。(2)办学经费完全由政府负担,和国剧运动等的同仁民间性质完全不同,表明国难深重年代政府对该校的高度重视。(3)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戏剧教育理念。倡议人中有很多留学生,了解欧美各国对戏剧社教功能的重视:“故欧美各国莫不视戏剧为辅助社会教育之利器。至于新兴之国家,如意德俄诸国,对于戏剧之提倡,戏剧教育之重视,皆非他国所能及”⑩。(4)确立了明确的教学目标,即倡导与辅助戏剧社会教育、宣传抗战、开启民智。针对当时不少人以为戏剧是消遣娱乐,是“不急之务”,倡议书清晰地阐明戏剧尤其话剧是社会教育的利器:“戏剧既为宣传主义,教导民众及改良风俗之利器,而戏剧中之话剧,尤足以负此重任,盖话剧能应

---

① 余上沅:《教育电影与戏剧》,《教育与民众》,1936 年第 7 卷第 8 期,第 1452 – 1453 页。

② 余上沅:《教育电影与戏剧》,《教育与民众》,1936 年第 7 卷第 8 期,第 1454 – 1455 页。

③ 笔者曾有研究专涉于此,以下戏剧内容详见丁芳芳:《论抗战时期民族演剧形式探索》,《戏剧艺术》,2010 年第 1 期。

④ 余上沅:《戏剧与侨胞》,《华侨先锋》,1947 年第 9 卷第 3 – 4 期,第 16 页。

⑤ 余上沅:《戏剧与侨胞》,《华侨先锋》,1947 年第 9 卷第 3 – 4 期,第 16 页。

⑥ 余上沅:《戏剧与侨胞》,《华侨先锋》,1947 年第 9 卷第 3 – 4 期,第 16 页。

⑦ 抗战期间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和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部长。

⑧ 张道藩:《国立戏剧学校之创立》,原载《民国廿五年国立戏剧学校一览》,南京:国立戏剧学校,1936 年。转引自刘子凌编:《话剧与社会——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话剧文献史料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

⑨ 详见丁芳芳:《抗战戏剧与战时社会教育规划》,《戏剧艺术》,2012 年第 6 期。

⑩ 张道藩:《国立戏剧学校之创立》,原载《民国廿五年国立戏剧学校一览》,南京:国立戏剧学校,1936 年。转引自刘子凌编:《话剧与社会——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话剧文献史料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

用国语,甚至于可因事实之需要,应用各种方言,作为对话剧本,再佐以人生现实之表演,其感人之深,当远甚于偏重歌唱及表演技术之昆曲皮簧……话剧之宜于启迪民智也明甚。”①

2. 余作为剧校校长的戏剧社教工作宗旨和规划。剧校的设立是为了即将爆发的抗战作准备,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界、教育界和戏剧界的联合行为,这注定了它的历史使命不可能只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更主要的是承担着开展戏剧社教工作、培养戏剧社教人才的重任。国立戏剧学校经各方论证制定有“国立戏剧学校章程”,它明确规定:“第一条本校定名为国立戏剧学校由中央宣传部及教育部会同管理之。第二条本校以研究戏剧艺术、养成实用戏剧人才、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②

余由胡适推荐、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直接任命担任剧校校长,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这一任命过程决定了他在相当程度上是国民政府亟需实行的抗战戏剧社教规划的代言人和实践者,即战时其校长的工作宗旨和规划甚至主要不是进行戏剧艺术教育,而是开展戏剧社教活动。③ 正如已有研究者指出:“1935 年他担任了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一职,表明他接受了戏剧的社会教育意义以及以话剧形态为标准的提法。国立戏剧学校由张道藩等国民党高层倡议兴建,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辅助社会教育’,并且由这一目的规定了戏剧建设应由话剧为中心的路向。”④余也多次撰文阐明国立戏剧学校的办学宗旨:“学校是以‘研究戏剧艺术,养成实用戏剧人才,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的。”⑤为此特成立研究部,以戏剧社教指导为工作重点:“一、设立研究部。聘请国内戏剧学者,指导一部分毕业生从事戏剧艺术各部门之研究工作,并调查各省地方戏剧暨话剧之演出实况,剧团组织,剧院设备,刊物出版以及剧本创作与翻译等等情形,更以通信或其他方法辅导全国的戏剧运动。换言之,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校在我们苦干地努力下,能够成为全国戏剧运动的总枢纽。”⑥

三、抗战戏剧社教实践之一:社教公演、剧作丛书出版

余上沅的抗战戏剧社教实践之一是以国立剧校为中心,主要包括:社教公演和剧作丛书出版。

1. 社教公演。剧校开展了大量的戏剧社教公演活动,很多是和抗战各种社会组织合作的。限于篇幅仅以一例说明:

1940 年 4 月剧团应抗战妇女工作队之邀赴渝公演,余上沅详细记录其经过:“先经演出委员会决定此次公演剧目为:(一)顾一樵先生之《岳飞》,(二)我与王思曾先生之《从军乐》及(三)曹禺先生新作之《蜕变》。三剧皆为多幕‘重头戏’,一古装,一非写实,一写实,风味各别,而内容之有利于抗战宣传则一,对于剧目编排上,可谓尽善尽美”⑦,“十五日起至十八日上演曹禺先生新著四幕抗战问题剧《蜕变》,由张骏祥先生导演,二年级生主演。该剧系曹禺先生三年来第一部精心之作,对抗战时期行政问题有确切之指示与启发,并暗示新中国之诞生必须经过一从黑暗到光明之‘蜕变’过程。所予观众印象至属深刻,群认为系抗战以来第一部有力杰作”⑧。因物价高涨,公演后扣除各项开支,还“托教育部妇

① 张道藩:《国立戏剧学校之创立》,原载《民国廿五年国立戏剧学校一览》,南京:国立戏剧学校,1936 年。转自刘子凌编:《话剧与社会——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话剧文献史料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

② 李乃忱编著:《国立剧专史料集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 年版,第 628 页。

③ 史学界提出的自 1931 年起 14 年抗战史,“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意识到对日战争不可避免,从各方面开始多作准备。自上而下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宣传部制定的抗战戏剧社会教育规划正是其中之一。详见丁芳芳:《抗战戏剧与战时社会教育规划》,《戏剧艺术》,2012 年第 6 期。

④ 陈建军:《一个“半”残破的梦——余上沅与国剧运动》,《戏剧文学》,2006 年第 12 期。

⑤ 余上沅:《我们的国立戏剧学校——为学校周年新闻纪念特刊作》,杭州:《学校新闻》,1937 年(周年纪念特刊),第 16 页。

⑥ 余上沅:《我们的国立戏剧学校——为学校新闻周年纪念特刊作》,杭州:《学校新闻》,1937 年(周年纪念特刊),第 16 页。

⑦ 余上沅:《国立剧校旅渝劳军公演记》,成都:《戏剧战线》,1940 年第 12 期,第 19 页。

⑧ 余上沅:《国立剧校旅渝劳军公演记》,成都:《戏剧战线》,1940 年第 12 期,第 20 页。

女工作队转捐劳军等欵六千元”①。

为广泛开展工作,剧校寻求多种易为大众接受的演剧形式。如小型茶馆剧:“力避演剧形式,演员扮做茶客分别入座,造成故事,引起其他茶客之注意,并逐渐展开,以达教育的效果。”②还有趣味戏剧形式的探索,如1940年《从军乐》“这出载歌载舞配音喜剧由余上沅、王思曾编剧……演出广告以‘卡通式的表演,流线型的演出’为号召”③。战时居民经济困难,余认为凭物公演“是普及戏剧教育的最好方法,所选剧目应以简单为主,尤应深入浅出。因为这种观众泰半属于贫民,而其入场券仅不过以实物代替,大者半斤猪肉,小者一颗蒜头,即可入场”④。这种灵活的演出方式很成功:“国立剧专结合当地民众经济情况试行‘凭物看戏’,农民、荣誉军人、市民以鸡、鸭、蛋、地瓜、青茶、点心作票款看戏,收入约值三百元以上。”⑤

此类公演常被媒体强烈关注,如1938年4月剧校在国泰大戏院作来渝后第一次公演:《新蜀报》特作国立剧校公演《飞将军》特刊:“登有余上沅的《致辞》、郭蓝田的《我们的〈飞将军〉》,18日发表萧崇素的《评国立戏校的公演——观〈爱与仇〉、〈飞将军〉后》。”⑥剧校的诸多演剧活动得到政府支持,如1940年4月“国民外交协会上午在国泰大戏院招待各国驻华大使观看国立戏剧学校演出的《岳飞》。到苏联大使潘友新,美国大使詹森,英国大使卡尔等七十余人。各大使馆翻译人员讲解,对剧中动人场面一致鼓掌,并向编剧顾一樵索读剧本”⑦,这表明剧校深度参与了抗战重要的文化工作。

2.抗战剧作丛书出版。为解决战时剧本荒,余上沅亲写街头剧,鼓励剧校老师创作剧本,以“国立戏剧学校战时戏剧小丛书”结集出版⑧,并亲作“小引”:“戏剧为唤起民众、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之良好工具,尽人皆知……本校使命所在,不敢后人;除向民间作抗战戏剧宣传之演出,并协助各抗敌团体作同样工作外,特将本校员生最近创制或改编之戏剧作品编为战时戏剧小丛书,以应需求,籍合实用。”⑨丛书充分关注抗战戏剧社教的需要,如李庆华细致总结了街头剧《觉悟》的创作心得:“首先注意剧中人的性格”,“伤兵最好能说北方话,尤其是以山东话或徐州话为最相宜,因为伤兵很有些位是北方人,听起来比较亲切真实……演出地点,当然是在街头或者是在广场为最相宜,更希望和观众打成一片……在演出之后,如有观众演说,当尽量欢迎,以增加宣传的实效”等。张逸生改编街头剧《香姐》:“本剧本是从《放下你的辫子》改编而成……目前正闹着剧本荒,我们认为解决的办法,一方面需要努力于新的创作,一方面需要把旧有作品注入新的内容,使它合用。为了避免观众在看戏以后所得到的是感伤……所以给剧中工人加了一长段演讲,把观众的情绪激发起来。”⑩

---

① 余上沅:《国立剧校旅渝劳军公演记》,成都:《戏剧战线》,1940年第12期,第20页。

② 余上沅:《戏剧与侨胞》,重庆:《华侨先锋》,1947年第三四期,第16页。

③ 石曼:《重庆抗战剧坛纪事:1937年7月–1946年6月》,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④ 余上沅:《戏剧与侨胞》,重庆:《华侨先锋》1947年第三四期,第16页。

⑤ 石曼:《重庆抗战剧坛纪事:1937年7月–1946年6月》,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⑥ 石曼:《重庆抗战剧坛纪事:1937年7月–1946年6月》,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⑦ 石曼:《重庆抗战剧坛纪事:1937年7月–1946年6月》,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⑧ 笔者曾查阅到此书原件:标明“国立戏剧学校战时戏剧小丛书,出版者:国立戏剧学校,1940年1月初版。代售处:全国各大书店,印刷者:长沙碧云轩等,含李庆华执笔的街头剧《觉悟》(文末著1937年11月27日,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可见出版之神速”。张道藩著独幕剧《杀敌报国》、洗群编的《正反》、谷剑尘执笔的街头剧《流亡者之歌》(封面上标明有七种)、谢重开编的独幕剧《拆桥》等十种,在《拆桥》中列出了十种目录:1.炸药,独幕剧,王思曾改编;2.疯了的母亲,街头剧,骆文宏等;3.觉悟,街头剧,李庆华等;4.杀敌报国,张道藩,独幕剧;5.反正,独幕剧,洗群(《反正》,也是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完成,在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6.毁家纾难,独幕剧,文治平;7.流亡者之歌,街头剧,谷剑尘等;8.香姐,街头剧,张逸生改编;9.新孝道,街头剧,郭蓝田等;10.拆桥,独幕剧,谢重开,都为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⑨ 余上沅:“小引”,《国立戏剧学校战时戏剧小丛书》,出版者:国立戏剧学校,代售处:全国各大书店,印刷者:长沙碧云轩等,1940年1月。

⑩ 张逸生:《香姐》序,国立戏剧学校《国立戏剧学校战时戏剧小丛书》,1940年版,第24页,出版者:国立戏剧学校,代售处:全国各大书店,印刷者:长沙碧云轩等,1940年1月。

四、抗战戏剧社教实践之二:战时戏剧辅导委员会、戏剧短期训练班、暑期戏剧讲座

余上沅多次强调:“辅导工作:对于促进剧运及辅导各方面戏剧活动,亦为本校工作之一,凡有所需,如关于戏剧之导演,剧团之组织,剧团工作之设计,舞台工作之指导与协助,化装之实施与制造,剧本之介绍,布景,道具,服装等件之代制与借用,戏剧工作人员之介绍等事项,无不在经常协助辅导之中,又出有‘校友月刊’,并设有‘戏剧通讯社’,以利沟通。”①工作主要包括三部分:战时戏剧辅导委员会、戏剧短期训练班、暑期戏剧讲座。

1. 设立社教推行委员会和战时戏剧辅导委员会:“本校为推展剧运,特设社教推行委员会专司其事,一切设施也均以教导民众为中心”②,“抗战以来,戏剧运动日益展开,戏剧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来校请求协助者络绎不绝,本校为应付此种需要,藉以服务社会,推广戏剧教育,乃于二十七年九月组织‘战时戏剧辅导委员会’专司此事”。辅导工作方面极为广泛:“如导演,化妆,装置设计等技术的指导,布景,灯光,效果,服装,化妆品等演剧用品之出借或代制,剧本理论丛书及宣传资料之供应,皆是。自该会成立以来,所辅导之学校机关及戏剧团体,不胜枚举。”③

余具体说明了这“战时戏剧辅导委员会”的工作:“目的在予国内戏剧工作者以人力物力之帮助,减少其工作上之困难,我们的工作范围已涉及工厂,学校,兵团,以及其他机关,地域方面遍及国内各省”④,“工作分列下述四类——(一)指导工作。(1)剧本之导演,(2)剧团之组织,(3)剧团工作之设计,(4)舞台工作之指导与协助,(5)舞台技术及表演技术之指导,(6)剧本演出示范。(二)训练工作。(1)举办戏剧讲座,(2)举办戏剧工作人员训练班。(三)供应工作。(1)剧本供给与介绍,(2)布景道具之代制与借给,(3)化装品之代制与代购,(4)戏剧指导人员之介绍。(四)编辑工作。(1)抗战建国剧本之编制,(2)戏剧丛书之编制,(3)发刊‘剧坛情报’与‘戏剧周刊’。”⑤虽然“上述这些计划,过去以抗战期间,交通阻碍,物力维艰,只有部份实现”⑥,但至少可说明“战时戏剧辅导委员会”完整的抗战戏剧社教工作计划。

2. 设立抗战戏剧社教短期训练班

剧校的戏剧短训班主要是训练戏剧社教人员以满足社会需要:“在各学校、各社教团体开办过训练班,先后受训者共约数千人。我们认为这样所得的效果比我们本身组织剧团演戏所发生的影响要来得大。因为这样训练出来的干部,一个人去主持一人剧团,推进一个地方的剧运;十个人就主持十个剧团,战时剧运就扩展到十个地方;而且除了我们所给他们的技术之外,加上他们自己历年来从事工作的经验,再传授给他人,这样逐渐扩展开来,就可以发生无穷的力量”⑦。以剧校由南京迁往长沙时为例,“我们觉悟到偌大的湖南,仅靠本校一个团体来作这种工作,效率是绝对不够的。我们需要全湖南的学校和团体同我们联合起来一块而干”⑧,为此制定了周密可行的工作规划:“第一步我们毛遂自荐,向全长沙市的大中学发了一封信,表示本校拟派戏剧队前赴各校……藉资训练各校之宣传技术,共为宣传工作尽力。”⑨培训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定期举行示范表演的有 40 余校,本 000(笔者注:三字不清,疑为‘校均顺’)序一一梳理,各学校的宣传团体之组织,因此加增了很多,并且在最短期间都有了实际的工

① 余上沅:《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概况》,汉口:《教育通讯》,1947 年(复刊 3 第 12 期),第 29 页。
② 余上沅:《戏剧与侨胞》,重庆:《华侨先锋》,1947 年第 3 – 4 期,第 16 页。
③ 余上沅:《抗战三年来的国立剧校》,重庆:《现代华侨》,1940 年第 1 卷第 6 – 7 期,第 23 页。
④ 余上沅:《戏剧与侨胞》,重庆:《华侨先锋》,1947 年第 3 – 4 期,第 16 页。
⑤ 余上沅:《戏剧与侨胞》,重庆:《华侨先锋》,1947 年第 3 – 4 期,第 16 页。
⑥ 余上沅:《戏剧与侨胞》,重庆:《华侨先锋》,1947 年第 3 – 4 期,第 16 页。
⑦ 余上沅:《开讲词》,《战时戏剧讲座》(国立戏剧学校战时戏剧丛书之二),主编者:国立戏剧学校,正中书局,1940 年版
⑧ 余上沅:《抗战三年来的国立剧校》,重庆:《现代华侨》,1940 年第 1 卷第 6 – 7 期,第 22 页。
⑨ 余上沅:《抗战三年来的国立剧校》,重庆:《现代华侨》,1940 年第 1 卷第 6 – 7 期,第 22 页。

作表现……得到很好的成绩。”①在正规的两年制教育期限之外“应社会需要,附设特别训练班,修业期限为六个月”②。另外“于二十七年十一月举办第一期‘战时戏剧工作人员短期训练班’,利用业余时间,每日晚间上课,教员由本校考职员义务担任。计投考三十余人,经录取者十九人,至二十八年一月底训练期满准予结业者十三人,现该生等多亦于业余从事戏剧活动,成绩斐然可观”③。

3. 举行戏剧社教讲座并编辑理论丛书。1937 年“暑假期间,并曾为适应当时社会需要,加强戏剧宣传工作力量起见,特举办暑期战时戏剧讲座,招收听讲员一百名,讲师则骋请本校教员及校外戏剧界名人担任。讲期半个月,所有讲词均详细笔记,编入本校战时戏剧丛书,题名‘战时戏剧讲座’”④。该丛书系“国立戏剧学校战时戏剧丛书之二”⑤。余指出:“为什么国立戏剧学校要办这个戏剧讲座? 我们认为在战时,后方的一切文化教育应该和前方的英勇抗战配合起来”⑥。培训数量众多的有丰富戏剧技术知识的干部是戏剧社教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但“本校教员人数很少,平常又因为上课的关系,不易抽空多从事于戏剧辅导工作”⑦。系列讲座着眼点是如何培养与训练基层演剧人才,无枯涩艰深理论而多实际化操作,内容非常具体实用。如姜公伟分析戏剧是配合抗战政治宣传的最好工具,内容与演出方式应彻底大众化⑧,推荐“我国英勇将士作战的功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汉奸罪恶的描写”等十二种抗战题材,并特别指出剧团组织与战时舞台装置要讲求简单化、流动性、经济化等,对“前方的随军剧团”和“后方的乡村剧团”的舞台装置如何制作化妆油彩、头套等小道具、如何卸妆等都有详解。⑨ 吴祖光专门做“语音”训练讲座,讲解如何处理声音与表情的关系、以什么样的声调表现什么样的感情等。该讲座甚至提到演出前一定要去各地方政府办公文,以避免麻烦,但又不能让群众认为你只和官吏好;“开演之前,最普通的办法,是打一阵锣鼓,附近的人听到锣鼓声,自然会聚集笼来”⑩,演出之后一定要清理场地、归还所借物品再出发等,是一本体系化的、完全为战时演出宣传所需要的小册子。

综上所述,抗战戏剧社教工作启迪民智、焕起全民族的抗战激情,为赢得最后胜利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起到了巨大作用,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文化抗战的极重要部分。大量一手史料表明作为重要的组织、实施者,余上沅的理论呼吁及全方位实践是抗战戏剧社教工作的重要部分,他的抗战戏剧社教观的形成和当时的抗战时代大势密切相联。因此,在我看来,他的历史贡献并不仅止于国剧运动及戏剧艺术教育,更在于他在抗战民族危难之际以深切的社会责任感,清楚职责所在和以社会教育为“唯一之使命”的历史担当。其社会影响力和历史贡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国剧运动时期,达到了其戏剧生涯的高峰点。

(责任编辑:素微)

① 余上沅:《抗战三年来的国立剧校》,重庆:《现代华侨》,1940 年第 1 卷第 6 – 7 期,第 22 页。
② 余上沅:《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概况》,汉口:《教育通讯》,1947 年(复刊 3 第 12 期),第 27 页。
③ 余上沅:《抗战三年来的国立剧校》,重庆:《现代华侨》,1940 年第 1 卷第 6 – 7 期,第 23 页。
④ 余上沅:《抗战三年来的国立剧校》,重庆:《现代华侨》,1940 年第 1 卷第 6 – 7 期,第 23 页。
⑤ 《战时戏剧讲座》,国立戏剧学校主编,重庆:正中书局印行,1940 年 1 月初版,“目录:一. 开讲词:余上沅 二. 战时戏剧的特质与任务,姜公伟 三. 新演出法,杨村彬 四. 导演术,余上沅 五. 编剧术,万家宝 六. 创作前的准备,宋之的 七. 舞台装置,贺孟府 八. 表演术 陈治策 九. 演员的语音训练与困难补救,吴祖光 十. 化妆术,陈永倥 十一. 剧团组织与管理,阎哲吾 十二. 演剧人员的认识与修养,萧崇素 十三. 抗战剧运的前瞻与后顾,潘孑农 十四. 后记,阎哲吾”。
⑥ 余上沅:《战时戏剧讲座》开讲词,重庆:正中书局:《战时戏剧讲座》,1940 年版,第 1 页。
⑦ 余上沅:《战时戏剧讲座》开讲词,重庆:正中书局《战时戏剧讲座》,1940 年版,第 1 页。
⑧ 姜公伟:《战时戏剧的特质与任务》,重庆:正中书局:《战时戏剧讲座》,1940 年版,第 4 – 6 页。
⑨ 参见国立戏剧学校主编:《战时戏剧讲座》(国立戏剧学校战时戏剧丛书之二),重庆:正中书局,1940 年版,第 5 – 10 页。
⑩ 国立戏剧学校主编:《战时戏剧讲座》(国立戏剧学校战时戏剧丛书之二),重庆:正中书局,1940 年版,第 113 页。